

一封公开信影响一代人

（上接 B01版）

那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能不能行？有人就提出，老百姓常讲“老大憨厚、老二聪明、老三猴精”，不要老二老三，会不会把未来的发明家、科学家弄没了。对此，又有人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名人为例，说明头生子智力不比老二老三差，毛泽东、鲁迅都是老大，就是有力证明。

那么，劳动力会不会出现短缺，问劳动部；兵源会不会短缺，问武装部；教育会不会出现问题，问教育部……还有孩子的抚养问题、养老问题，家庭结构问题、男女比例失调问题等等，甚至，因为唐山地震，有人提出万一出现灾难，独生子女在家里都无人知道无人管该怎么办？

在走访调查独生子女家庭的时候，许多家庭没有遇到想到的问题，起草《公开信》之前，都被专家想到了。

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还不能搞“一刀切”，针对某些困难群众和少数民族，可适当放宽。

“可见当时党中央对这件事是非常认真、谨慎的，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一拍桌子就定下来的。”张敏才告诉本报记者，《公开信》从起草到发表共用了3个月的时间。

要给百姓

吃两个“定心丸”

一是不能搞一刀切，二是政策不是长远的，是阶段性的。

《公开信》的起草工作，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同志领导，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真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具体组织。

宋健以控制论专家的博学多识写了近两万字的初稿，富于科学性和趣味性。

人口学家刘铮也写了一个初稿，他是统计学出身，列举了许多数据，学术性强，也有六七千字。

之后，书记处研究室又召集参加起草的八位同志开会，就《公开信》的内容、写法和要求进行深入讨论。一致认为，《公开信》要突出的几个特点：要短，长了读的人就少了；文字要通俗，让老百姓看得懂；要回答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既讲好处，也讲弊端；给百姓吃两个“定心丸”：一是不能搞一刀切，二是政策不是长远的，是阶段性的。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议到的问题，《公开信》几乎都想到了，讲到了。诚恳透明，实话实说。”

“当时由于宋健和刘铮同志很忙，会议确定在栗秀真、梅行、苏沛、刘庆山同志指导下，由王连城和我执笔。”张敏才被大伙儿认为“文如其名”。

会后，两人日夜赶写，每写一稿都由梅行、苏沛组织一次讨论，提出详尽意见。如此反复，一连写了六稿。

基本接近发表时的样子了，又经过胡乔木审阅修改，提交书记处讨论。

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见报发表。

“那时发避孕药，不仅不要钱，还给送到家里去”

当时的计生干部，几乎都练就了一副“铜头”（不怕碰钉子）、“铁嘴”（耐心做说服工作）、“橡皮肚子”（能受气）、“飞毛腿”（能跑）的本领。

《公开信》把全体党员和他们所联系的亿万人民摆在主人翁的地位，有些基层党组织在学习《公开信》时，书记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党中央给咱们来信了”。

《公开信》发表后，全国大街小巷、穷乡僻壤，到处张贴，到处传诵，老少皆知。

为了打消已婚育龄妇女对落实节育措施的疑虑，许多领导干部的家属，年过四十了，已经没有生育要求，还是率先躺在手术床上，接受节育手术。

在医院妇产科，病房中，走廊上，礼堂里，挤满了来自农村的育龄妇女，积极落实节育措施。

“那时候人的思想是单纯的，有的人就明确表态，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不要孩子都可以。”

“那时候发放避孕药和避孕套，为了避免群众不好意思，不仅不要钱，还给送到家里去。”

当时的计生干部，几乎都练就了一副“铜头”（不怕碰钉子）、“铁嘴”（耐心做说服工作）、“橡皮肚子”（能受气）、“飞毛腿”（能跑）的本领。

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中，控制人口增长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在《公开信》发表前的一年时间里，邓小平先后四次和国外客人谈到人口和现代化问题，指出国外某些人攻击我国的计划生育，实际上是不愿意我们发展起来。邓小平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条杠杠不能突破，这条杠杠突破了，四化就没有希望了。”

最受关注的一句话

在张敏才看来，通过“独一代”的奉献，人口“金字塔”已经变成“纺锤形”，中国不再需要制造“独二代”。

约30年前，电视上曾经播出这样一个画面，记者和一个放羊娃对话：“放羊干什么？”“挣钱。”“挣钱干什么？”“盖房。”“盖房干什么？”“讨婆娘。”“讨婆娘干什么？”“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发生根本的变化。生儿女不再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开始重视教育。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公开信》把人口增长降下来，把经济增长搞上去的预期目标已圆满实现，中国人口已走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开始步入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趋向协调的科学发展轨道。”在张敏才看来，《公开信》功不可没。

如今，纪念《公开信》发表30周年，里面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似乎发出一个信号：《公开信》已经完成了使命。

社会上对于政策是否会放宽引起了热烈讨论。

对此，张敏才有自己的看法，“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口政策一直都在不断完善，只不过它是在缓缓地平稳地变化，就像火车进站一样，让人感觉不出来。”

9月21日，李克强出席做好人口计生工作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发言，“他的发言中的语句‘在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还有‘逐步完善政策’，都可以看出来释放了一些政策方面的信号，政策肯定会调整，但肯定不会突然放开，必须是在“稳定”和“适度”的基础上。”

在张敏才看来，通过“独一代”的奉献，人口“金字塔”已经变成“纺锤形”，中国不再需要制造“独二代”。

不同年代的计划生育标语



计划生育之历史节点

本报记者 鲁超国

1957年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我的理论经得起历史考验

如今，一些想要多孩子的人还会骂一个人——马寅初，好像他就是计划生育的始作俑者。

1957年7月15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论》。

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

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受到批评。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点名批评了马寅初：“马老要对他《新人口论》作检讨。”7月1日，康生向北大师生作报告时讲：“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作是马尔萨斯的马！”有人逼马寅初作检讨，他坚决拒绝，再一次发出誓言：不怕孤立，不怕坐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后来有人说“批错了一个人，增加了几亿人”。

1974年 毛泽东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其实，毛泽东早就关注“人口问题”了。

1954年1月，中央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并保证子女得到教育和就业的机会。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

1973年，各地区各基层单位陆续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当时，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

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

1980年 《公开信》发表：计划生育的里程碑

今年，全国各地掀起了纪念《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发表30周年活动。很多人把《公开信》发表的1980年作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具有转折性和标志性的—年。

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搞的。1974年后，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减少，但是总体效果并不明显。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个孩子，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表了《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至199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徘徊在10%—17%之间，1998年之后增长率的数字变成了个位数。

按国家统一的测算标准，少生100万人相当于增加80多亿元的GDP总量；可为家庭节约抚养成本200多亿元；为国家和社会节约抚养成本600亿元；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0.8亩耕地警戒线计算，可节省耕地800多万亩。

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2002年9月1日开始施行，至今。

本文参考《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计划生育[50—70年代]》、《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等材料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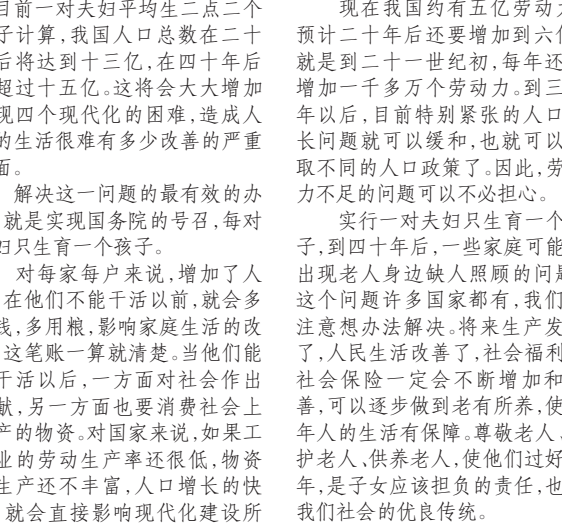
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并且认真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建国以来，由于卫生工作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尤其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寿命大大延长。但是，我们长期对人口出生率没有适当控制，致使人口增长过快，旧中国从一八四零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零九年中，全国只增加人口一点三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三十年中，出生了人口六亿多，除去死亡，净增四亿二千万人。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里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尤其严重的是，我国人口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零年这段时间增加得最快，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六十五，今后每年平均将有二千万多人进入结婚生育期。如果不从现在起用三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十—三十年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长，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十三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十五亿。这将会大大地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对每家每户来说，增加了人口，在他们不能干活以前，就会多—用—钱，多—用—粮，影响家庭生活的改善，这笔账一算就清楚。当他们能够干活以后，一方面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消费社会上生产的物资。对国家来说，如果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护—农—业的生产还不丰富，人口增长的快—慢，就会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的速度。

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四十年后，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老人身边缺人照顾的问题。这个问题许多国家都有，我们要注意想办法解决。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尊敬老人、爱护老人、供养老人，使我们过好晚年，是子女应该担—负—的—责—任，也是我们社会的优良传统。



各种形式的计划生育宣传



在济南一家早教中心，父母正在陪孩子一起“上班”。

上有“四老”下有“独二代”当“小皇帝”成长为“独一代”

本报记者 鲁超国

作为计划生育产物的“独一代”，自诞生，就被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那时候其实我们都忙工作，城市里的90%以上的孩子都是在幼儿园长大的，根本没条件‘惯养’，现在的孩子才算‘惯养’。”“独一代”王欣的母亲张长文说。王欣1983年出生，已经有了儿子牛牛，不到2岁，每周游泳一次，去一家幼教中心“上课”一次……这个家庭每个月为他支出费用三四千元。进入婚育期的“独一代”，当他们面临“独二代”时，面临就业、养老等压力时，内心感受又如何呢？

他们诞生的那个年代——

“党让干啥咱干啥，肯定没错”

53岁的张长文已经退休了，毫无疑问地承担起照顾外孙的责任。

“牛牛，渴不渴啊，喝点东西。”张长文将奶瓶往孩子嘴里塞。牛牛专心玩着“挖掘机”，扭着头躲闪着，最后干脆跑开了。

“慢点慢点。”张长文连忙起身跟上去。

这个情景发生在济南正觉寺小区一栋居民楼家里，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卧室的窗台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

房子里还有一个“阿姨”——这户人家请来的保姆，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帮着做家务，一个月工资1200元。

张长文1981年结婚，正是提倡“只生一个好”的年代。

她姊妹5个，“有两个的都算少的”，父辈的普遍思想是“孩子越多越有福，越光荣”。

“到了1980年，突然严了。”那时候，墙上到处被刷上了“想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优生 幸福一生”之类的标语。广播里天天讲“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单位有了专职的计生工作人员，大会小会宣传计生工作。

“那时候，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真是起了大作用了。眼可尖了，谁家媳妇的肚子大了，立马知道。”老太太们还会移动小脚，徒步为儿跑到各家各户召集开会。

那时候张长文没有做任何的思想斗争，思想非常单纯，“党让干啥咱干啥。肯定没错，肯定光荣。”

“也有超生的，城市的很少，一般是没有公职的，农村可能多些。”在那个摆地摊都遭歧视的年代，“铁饭碗”被看得很重，“超生”和“离婚”一样丢人。

“结婚了之后还不能立马要孩子，单位给你列上计划，然后拿了娃娃票，才能生孩子。”张长文24岁结婚，26岁生下了女儿王欣。

在四合院里长大的童年——

“那时脖子里都挂着钥匙”

张长文一共休了84天产假，然后就去上班了。

那时候大家对工作都有革命热情，都想出成绩，都想进步，谁也不想比谁差。王欣便由奶奶照看。

张长文当时在历下区的机关单位上班，丈夫在街道办上班。

每天8点上班早晨7点半出门，中午不回家，晚上5点半下班，6点多到家，然后给孩子喂奶，“白天一天吃的啥

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奶粉都很少见。”

王欣算是幸运的，有奶奶照看，因为她的叔叔早早接了老人的班。“那时候，爷爷奶奶辈的也就50多岁，都还没退休，都上班，没人看孩子。”

“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休完产假后，直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

王欣上小学了，有一个院子里的发小是同班同学，他们一起上学放学，学校离家很近，走10多分钟就到，“从来没有家长接送的，不像现在家长能把学校门堵了。”

“那时候我们脖子里都挂着钥匙，回家后先写作业，写完之后就跑到院子里玩。”

“在王欣记忆里，她的童年是轻松的、快乐的，不知道什么是孤独。

上世纪80年代的济南，很少有高楼大厦，都是大街小巷四合院。

四合院里住的少则几户，多则几十户。

“你帮我看着孩子，我去把锅坐上。”

“再帮我看会儿，我去炒个菜。”在院子里，随便哪个邻居，都可以帮着照看一会儿孩子，一个大人能看好几个孩子。

院子里总是有玩的人，有时候院子里没人，年龄大点的孩子也可以照着年龄小的，也没啥不放心的。

到了做饭的点儿，实在找不到人看孩子，就把孩子撂在床上，随便给个玩的东西，然后就可以去忙了。

张长文以前住的四合院里有20多户人家，“那时候真的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谁家包了水饺，都会先盛上几碗给邻居送去，谁家孩子大了，衣服小了，就送给小的孩子穿。对于送来的衣服，无论新旧，没有嫌弃的，不像现在。

比起一些也是“独一代”的同事来，王欣觉得自己很幸运：四位老人都是有单位的人，退休了有退休金，看病可以报销，家都在济南，过年的时候也不用愁去男方家还是女方家。

和王欣相比，梁颖则没那么轻松，梁颖是工薪阶层，双方家里掏光老底各自为他们凑了5万，他们自己攒了5万，付了首付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装修时，梁颖父母来看房，兴高采烈地“指导”了一番，然后又给了1万元装修费。装修好后，梁颖的公婆婆婆来看新房，两个老人也很激动，“老了就有着落了。”

梁颖和老公对望，然后商量：“看来还得买一套。”可是，装修时欠了一屁股债，每个月2000多元的房贷，然后加上生活费，两人基本上也属于“月光族”。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还是老人生病，现在一点积蓄都没有，万一哪一天急需用钱呢？”虽然有了房子，但是他们仍然心难安。

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独一代”才开始羡慕起那些有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了。

也没那么娇气，在地上摔跟头很正常，经常灰头土脸的，很少哭。”“只要不流血，家长也都不会感觉心疼。”

“我姥姥就说，宁愿看以前的10个孩子，也不愿意看现在的一个孩子。”

王欣笑着说，然后逗牛牛：“小宝贝，你是不是很难缠啊？”

王欣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但他们不打算再要二胎，原因是：成本高，养不起；牵扯自己精力大，影响工作。

“四二一”下的压力——

“老人健康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如果不是妈妈已经离休，王欣真的不知道牛牛应该由谁来照看。

王欣和老公的双方父母都在济南，典型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位老人两名年轻夫妇一个孩子）。

除了王欣的母亲张长文退休，其他三位老人还没有退休。

在牛牛出生前，张长文把家里收拾干净后，就经常参加老年俱乐部的一些活动，和一带老年人一起唱歌跳舞，没有“空巢”的孤寂和空虚。

现在，王欣小两口跟着张长文一起住。牛牛出生后，张长文就很少去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了。

因为双方父母都年轻，能帮他们分担很多，“现在担心的就是老人得病，那样的话我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会很累，所以说老人健康是我们最大的福气。”王欣说。

至于以后双方父母上了年纪后，给他们小两口带来多大的养老压力，王欣还没有想那么远。

比起一些也是“独一代”的同事来，王欣觉得自己很幸运：四位老人都是有单位的人，退休了有退休金，看病可以报销，家都在济南，过年的时候也不用愁去男方家还是女方家。

和王欣相比，梁颖则没那么轻松，梁颖是工薪阶层，双方家里掏光老底各自为他们凑了5万，他们自己攒了5万，付了首付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装修时，梁颖父母来看房，兴高采烈地“指导”了一番，然后又给了1万元装修费。装修好后，梁颖的公婆婆婆来看新房，两个老人也很激动，“老了就有着落了。”

梁颖和老公对望，然后商量：“看来还得买一套。”可是，装修时欠了一屁股债，每个月2000多元的房贷，然后加上生活费，两人基本上也属于“月光族”。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还是老人生病，现在一点积蓄都没有，万一哪一天急需用钱呢？”虽然有了房子，但是他们仍然心难安。

只有在这个问题上，“独一代”才开始羡慕起那些有兄弟姐妹的非独生子女了。